

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百年互动反思

倪胜利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要:民族文化生成于独特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以自发的方式代代相传,原始而简单,和谐而自然。百余年来,社会巨变导致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失去存在的条件。现代教育在民族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普及了科学文化,凝聚了民族精神,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对来自不同源头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融入主流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以同化为目的的教育,忽略了民族文化背景与民族生存的实际,使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日渐削弱。反思历史,透视现实,洞察未来,立足民族文化之根,认清并确立民族教育的当代使命和价值关怀,弘扬民族文化,挖掘并激发民族内源性发展动力,以开创民族生存的未来路径。

关键词: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现代教育;教育文化;内源性发展;和谐共生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7)06-0047-09

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来自不同源头、处在各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社会,逐渐汇入到一个联结全球的文化洪流之中,从而使民族的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是一个毁灭与再生交替更迭的时代。在远离中心的、僻远的、封闭的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人文生态,因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主流社会的文化扰动而经历了巨大的涨落。一些缺乏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逐渐消亡,而那些与时俱进的系统则获得了新生。纵观历史,民族发展力归根结底来自文化力,在各自独特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中,历史地、自发地生长起来的文化系统,其生存和发展必得与变化中的时空环境相适应,向着世界和未来全方位开放,以便不断开辟新的生境,获得更新与再生的丰富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百年来的历史也昭示我们,教育以同化为目的,无益于民族内在生长力的激发,甚至有可能削弱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底层的建构,有赖于各民族的和谐共生,其根本基础是民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化。现代教育只有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民族文化交流互动,求和而不趋同,才能激发和促进民族内在的生长力,使有千百年生命史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并以各自的特色融入时代的洪流,共同演奏出雄浑有力的时代交响乐。回顾历史,透视现实,认清并确立民族教育的当代使命和价值关怀,探索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实质性融合的有效途径,是我们反思民族文化与教育互动百年的意义所在。

一、民族教育文化原生态

文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按照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方式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

收稿日期:2017-09-29

作者简介:倪胜利,教育学博士,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丝路战略下西南民族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文化路径研究”(15BMZ050),项目负责人:倪胜利。

这个过程不断化生出在精神、物质、制度、习惯等方面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结构与秩序，它们被赋予符号意义并获得生命的功能，在不断变化的时空环境中，以自我复制和自我更新的方式发展。民族文化的形态发生，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密切关联^[1]。中国地大物博，地形地貌复杂，从雪域高原、深峡大川、戈壁荒漠、林海雪原，到盆地河谷、丘陵平原、丛林水乡、海洋河口，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地表系统，生成了立体分布的动植物群落。自然生态丰富多样，从而孕育了依赖不同的资源环境而生存的诸多民族。群黎百姓，逐水草而居；游牧渔猎，依时序而作。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秉厚德以养人，含万物而化光。大化流行，品物咸亨。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的人文景观，布诸山河林莽；崇德广业、化民成俗的文化动力，延续百代千年。发展力说到底还是文化力，民族的历史文化过程，凝聚了智慧，孕育了制度，创造了艺术，汇聚了物典，形成了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涌现出与其所处的天地系统相适应的文化群落和文明景观。

文明延续依靠教育，文化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自有文化，就有了传递文化的教育，教育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在特定生态环境中，自然地形成的民族文化以自发的方式代代相传，可视为原生态的教育文化。教育“教”什么的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类种群都面临的实在的生存问题。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有“教”和“学”的价值。在原生态的教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有“教”和“学”的东西与生存的一切方面，就像血和肉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最初阶段，一切都是简单的，教育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劳动技术的传递而已。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民族社会的发展，生活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族群成员交往不断扩大，多种需要及能力日益增长，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大大提高，教育文化也表现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传递知识和传承价值。例如：人们借助神话故事，寄托勇敢、正义、智慧、爱情等价值追求；在生产活动中教人合理安排农事，务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文言》）；在祭祀中宣扬善德的积累；在歌唱中追求高尚的品德和创造的才华，等等。总的来说，原生态的教育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丰富多样，有随境式的教育，也有制度化的教育；有宗教教育，也有世俗教育；有劳动教育，也有生活教育；有技术性的教育，也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有知识教育，也有道德教育；有艺术教育，也有体育。

无论是哪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与民族生存的实际密切关联，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境直接融为一体。人类经验的传递活动，从一开始就与生产劳动紧密联系着。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同生产劳动密切地融为一体的实例，在西南民族中比比皆是。刀耕火种的民族，在每一个生产环节，包括备耕、砍地、烧地、播种、催苗、薅草、收割、晒场等，都会有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如云南腾冲及保山一些地方的傈僳族人，在砍地、烧地、撒种前后会唱一首《请工调》。歌词涉及了劳作、农时、互助、合作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关于劳动品质与德行的教育，也有有机地融入到生产活动中。类似的教育情景不胜枚举。

生存斗争是残酷的，资源环境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族群在早期的迁徙以及漫长的“安顿下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有血与火的战斗，要有勇敢和智慧的首领率领族群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要有贞洁的爱情和婚姻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要尊奉一个神来寄托价值关怀以保佑族群繁荣昌盛，这一切都记载在传说和神话中。有斗争就会有流血牺牲，为抢夺资源而殊死相搏的族类，生存的机会远不如和谐共生的部落。共生共荣是生态世界的根本法则。在民族社会，这是来自生存实际的经验，是千百年来积累的智慧。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个体成员之间，无不适用这个法则。自私、欺骗、暴虐等无论在哪里都是被人瞧不起的。当具有正向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以格言的方式呈现时，就蕴含着极强的教育功能。各个民族都有广泛流传的格言，其教化之功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节日和仪式也是教育。许多少数民族节日，都承载着与族群的延续和文明传递相关的价值与意义。西南地区许多民族节日如大理白族的“三月三”“蝴蝶会”、镇宁布依族的“六月六”、黔东南一带的“芦笙节”、仡佬族的“灯杆节”、瑶族的“盘王节”、水族的“洗澡节”、康定藏族的“赏花节”、云南

白水台纳西族的“三朵节”等,多是为少男少女充分展示才艺提供机会,使其在歌舞狂欢之中各寻意中人。婚姻集中地体现着道德命题,饮食男女皆为人之本性,若无道德约束,野蛮与非礼横行霸道,秩序紊乱会导致系统崩溃。对“性”的放纵,犹如将野兽放出笼子。财富和权势并不总是择偶的标准,节日里的才俊与佳丽,总是以美丽、善良、勤劳、勇敢、智慧、能干、灵巧等优良品质取胜。另外,节日里展现出的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服装、饰物、用具等,物典云集、精华荟萃,是民族文化的博览会,也是丰富的文化生态园。每一件器物或饰品,都闪耀着民族特有的智慧并折射出族群生存的价值观。

诸如语言、仪式、服饰、建筑、壁画、图腾等作为文化过程结果的符号化的创造物,都负载着民族生存的价值追求,并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就图腾来说,亘古亘今,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不可简单化地将图腾一概视为封建糟粕,现代人在国徽、校徽等符号上寄托价值理念,本质上与此并无不同。一棵历经沧桑的大树、一块形态奇异的石头、一座雄伟的山峰、一个湛蓝的湖泊、一种与族群密切关联的动物,都会成为某种意义的载体。如果它成为了族群顶礼膜拜的对象,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物,它被创造为一种符号,负载着族群的价值追求,世代相传。而只有与天地合德的价值理念,才会获得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存在。图腾崇拜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凝聚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各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彝族、纳西族、傈僳族等都崇拜黑虎,而土家族、白族、普米族等则崇拜白虎。云南怒江州内的傈僳族人就有 20 余个不同的图腾:虎、熊、猴、蛇、羊、鸡、鸟等,它们都是傈僳族人崇拜的对象。古代羌族以羊为图腾,后演变为各种遗俗。如用羊来祭祀,将羊肉分赐众人以求福佑;穿戴羊皮,以求庇护等。祈求与寄托的愿景能否真的实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敬畏而知止,敬畏能使人抑恶扬善,知止则使行为有所规范。肆意妄为,举而不止,人间则有可能变成罪恶的渊薮。

教育者在原生态的文化传播中有特殊的地位,“师之所存”乃因“道之所存”,这是教育的真谛。在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中,具有教育资格的,必是族群中的精英。人类社会结构的初始形态中,巫、师、王通常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大多以“祭司”和“巫师”的身份充当知识、经验及其价值理念的传递者。族群的头人也常常是巫师。如哈尼族的陇巴头、基诺族的卓巴、布朗族的达曼、景颇族的董萨,等等,他们既组织农耕祭祀活动,又传递劳作的知识和技能,还负责协调族群各种关系并维护传统。很多时候,师者身份的确认直接来自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特异技能的展现。精英可以通过竞技的方式产生,也可以通过推举的方式,选出经验丰富的人。例如瑶族人就会通过狩猎活动,选拔出经验丰富、智慧超群的人做“祭司”或“巫师”,全权指挥狩猎、分配、祭祀山神等活动^[2]。他们成为本土知识的权威是理所当然的。西南有许多民族,如傈僳族、侗族、彝族、独龙族、拉祜族、普米族、怒族等,都盛行射弩比赛,比赛中的佼佼者就会成为人们崇敬和效法的榜样。实际上,这种情形存在于方方面面。精于生存之道者,必会成为师者。在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中,精英是由精心设计的教育培养出来的,而在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的原生态里,精英是通过自我教育,从生存实际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

文化不仅仅包括了诸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3]等作为过程之结果的精神性的存在,还有物典、语言、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甚至连身体,也是文化塑造的。更重要的是,应把文化理解为一个过程。原生态中的教育,无影无形,无声无息,无处不在,无人驾驭,有潜移默化之功。原始而简单,和谐而自然,若无现代文明和后工业时代经济技术的狂飙袭来,田园牧歌般的世外桃源不知还会持续多久。现如今,与世隔绝的时代里,各种原生文化曾有的辉煌被历史深深地埋藏,来自各个独立源头的文化汇入世界文化洪流成为历史的必然。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然遍及村寨部落,原生文化形态逐渐淡出视界。然而,对民族教育文化原生态的重新审视,是回归民族教育之道的必要前提,民族发展的文化之根和生存的动力之源不可无视。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是两个复杂的生命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主体间自主性、能动性生命联系,是

我们思考民族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出发点。

二、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互动世纪钩沉

现代教育进入民族地区,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不过那只是寥若晨星般点缀于广袤辽阔的僻远山乡的现代文明之光从无到有的起始点而已。进入20世纪,国门的开放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巨大变革,使民族地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随着新文化运动、民主革命、抵抗外侮、人民解放、和平建国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中心收拢着边缘,边缘向中心聚集,民族生存与国家命运必然地、内在地关联起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4]革命、战争、民族、国家成为汇聚一切信息和能量的话语中心,民族生存的现实困境与意识形态更迭紧密交织,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民族教育,则成为了唤醒民族自觉、激发民族精神、促使民族自立自强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途径。

前期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通过兴办新学,现代教育的触角开始向民族地区延伸。清末民初,人口数量较多且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如蒙、藏、回等有了专门的教科书,1909年的《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共有10册,内容涉及自然、历史、生产、生活、艺术、道德等各个方面,这便是中国特色双语教育的发端。辛亥革命后,许多民族地区开始形成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从办学主体、教育目标、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系统建构。初小教育内容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图画等,高小增加了地理、历史、格致等科目。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教科书从语言到文字,与主体民族没有区别。

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旨体现了“三民主义”思想,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5]。1929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蒙藏决议案》提出有关民族教科书问题的政策:“通令各蒙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辑各种书籍及本党党议之宣传品,实行普及国民教育,厉行识字运动,改善礼俗,使其人民能受三民主义之训育,具备自治之能力。”^[6]1931年9月3日,国民党中央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提到蒙藏各级学校使用的教材应特别注意“蒙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盥洗”“蒙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关于教材的内容,该“原则”提出:“在‘现代化’前提之下,国家文化与宗教内之优秀传统文化,同受尊重,编写教材,用以教导学生。”具体应包括:“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史;边疆和内地之地理的关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之历史及事实,边疆各民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其他有关边疆各民族人民特殊环境之教材。”^[7]⁸³⁰然而,尽管国民政府实施民族教育旨在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开发民智、巩固边防,但由于各方面的阻力和条件限制,举办新学步履艰难。在一些地方,“创办学堂招生之初,尽管广告贴遍全城街道,但应招者仍寥寥无几。热心新学者不得不多方奔走,拜访地方开明绅士、学者及商贾人士,宣传新学宗旨在于启迪民智,培养科学知识人才,挽救国运。并深入调查适龄儿童之家,登门造访其家长劝学。”^[8]从民族地区政府的教育机构名为“劝学所”^[9],也可知新学推进之艰难。并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学校,尚无人思考如何从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心理、智力条件及生活实际等方面的差异出发实施民族教育。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最初的交流和碰撞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民族教育话语转向边疆教育。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提出必须以边民全体为施教对象。“边疆教育”与以往国民政府提出的“蒙藏教育”“回民教育”“苗人教育”等所涉及的对象一样,只是“不将特定同胞的称号表明,一方面可免少数人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养成‘自外人群’的怪鄙思想,一方面把范围扩大,特定同胞界限以外的边疆人民,亦在教育领域之内。”^[7]⁸³³主张“边地教育应打破种族界限之观念”,以“养成国民统一之情绪,团结一致之精神”^[10]。边疆危机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日益加深,摒除民族偏见和隔阂,团结抗战成为共

识,于是人们不谈民族,只谈边疆。外敌入侵促使内部的团结高于一切利益,从而促进和加强了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的联系。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随着国家文化中心向西迁移,少数民族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兴起了许多师范学校和中小学。为推进边疆民族教育,国民政府曾要求各学校自编乡土教材,并颁发文件征集边疆教育乡土教材,主要内容涉及乡土历史地理、民间故事、民谣格言、乡土社会、文艺娱乐等各个方面。乡土教材包含较多的民族文化要素,从一定程度上也顾及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但总体来说,课程内容要体现民族统一和爱国精神,消除因地域和宗教观念所产生的隔阂。因此,这一时期民族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同化教育。

新中国的建立,将分别处于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迅速提升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社会变革的巨大跨越使教育担当起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的总方针,少数民族教育在教育目标、内容、途径等各个方面定位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友爱、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国家,在教育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中,既要避免大民族主义,也要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教科书的内容兼顾少数民族特点和国家公民教育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政策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应使用本民族语文教学。但在有本民族通用语言而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在创立出通用文字之前,可暂时用汉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教学。”^[1]建国后的三十年里,民族教育在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80年代以后,民族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教育在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配备、义务教育普及、学业成绩、高等教育参与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其进步的程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

当今时代,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民族教育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民族文化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现代教育,少数民族乡土教材编写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集中体现了这一趋势。近年来,更有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课程建设的人类学研究。总之,百年来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日益深化并向深度融合发展,从而为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互动的意义探赜与价值重构

以效果历史观思考历史效果,一切曾经存在过的,都与现存的和即将要发生的事件有着意义的关联。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两个从不同源头走来的文化系统,在经历了最初的碰撞与交流之后,逐渐汇合到一起,但这不过是弱势向强势的“趋合”,而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和合”。由于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强势文化的作用而导致的文化嬗变和价值观变迁,使同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近百年来,日益增长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化主体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同时,民族教育也在反思自身所走过的历程及存在的问题,以清醒认识自身应担当的历史使命和应发挥的作用。“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第十四章》)历史是连续的,文化生命是有根的,回归其根,方能不离其道。

对原生态教育文化的重新审视,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阐释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发展力归根结底来自文化力,文化源于生产与生活,又反过来为生产与生活之生生不息提供智慧和创造之动力源。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绵延不断的内生之力,源于自然,从洪荒走来,在当代式微。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自觉意识,只是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从各种矛盾和冲突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中逐渐生长出来并日益增强的。当今时代,一方面是文化主体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是日渐消亡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巨大的反差促成强烈的忧患意识。逐渐淡出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传统民族文化,激发了人们的回归取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回归不是返回原始和洪荒,历史不是简

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地发展,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观照起始点。教育不可能再回到田间地头,但历史向我们昭示了民族教育文化的基本原理:教育不能脱离文化之根,文化之根系于生存之土。

现代教育对民族地区的初始渗透,虽以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开发民智、巩固边防为宗旨,但其努力收效甚微。只要生产与生活方式不改变,再强势的文化也寸步难行。先驱者们怀着神圣的使命感,以致力于让文明之光穿透厚重的蒙昧与黑暗之墙、拯救生民于苦难的深渊为己任,只是在经历了失败和挫折,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后,才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的生活方式变化,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下而上的建构是成就一切事业最根本的秩序原则。人活着,才会有精神文化的追求。冷漠、厌倦、懒惰、逃避是那些饿着肚子被劝到学堂读书的孩子,对初始的现代教育的本能反应。他们身上自然地带有其所属文化的印记,尽管其对自身认知、心理、态度、价值观,很难说有自觉的意识,但其对现代教育的态度,反映了两个系统互动的初始状态。对许多曾是封闭的文化系统来说,似乎只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何以谈得上互动?这种文化系统存在着,并以自己的方式运行着,任何外来者都不能忽视它,而应适应它。只要它存在着,就影响着教育的决策和实施。它是在场的缺席,不言自明的存在,不行而至的力量,不为而成的教化。越是难以教育的民众,越有根深蒂固的惯性和不可动摇的韧性,越说明其固有生长力的旺盛,要改造这种生长力不能不伤及其根,伤根之举违背生态原理和共生之道。因此,教育良策的出发点应基于自身的调整 and 适应。

民族精神的激发,源于外敌的入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棠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在系统面临摧毁和打击,有亡国灭种之灾时,同宗同源者会再度凝聚成血肉相连的整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边疆教育”对一盘散沙的诸多民族着实起到了凝聚向心力的作用。民族团结、同仇敌忾,是和平时期无论投入多少教育资源(人力、物力、智力)都无法达到的效果。战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促成了超出主体意愿的历史效果。历史是一种“涌现”。然而,也须看到,“因同而合”不过是特定时期各种要素随机作用的综合效应而已。趋同,是这一特定时期应然的也是现实的从而也是成功的举措。“合”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分”是必然的、常在的。外战结束,内战爆发;炮火硝烟散去,不流血的战争悄然而至。整体和局部“分”与“合”的循环往复,是自然“摧毁各处以构筑一处”^[12]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系统从自生、自发到自觉,必得经历正反合的历史阶段,才能成熟和完善起来。

和平建国的宏伟大业,举而措之万民,彻底改变了诸多民族的生存状况。新文化的要素通过教育途径遍及一切角落。不过,这种“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致沿袭着同化的理念。只是在最晚近的时候,才开始向着文化生态回归,那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诸多弊端已然显现,包括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从繁华城镇到僻远山乡、从都市社会到种群部落的一切方面。穷极而反,原始返终,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由“趋同”转向“和而不同”的价值重构,是基于主体性的回归。“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获得普遍认同,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比“武力”更具有霸权性和隐而不显的毁灭性。孔子劝诫王者内修“七教”、外行“三至”,有“汤之灌雪”之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窳,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孔子家语·王言解》)。其积极意义在于统一的民族社会的秩序化建构。然而,对于从独立的源头生发的文化系统来说,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不在“化”中更生,就在“化”中消亡。同自然生态一样,文化生态的单一化意味着毁灭已经临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易·否》),苞桑之戒使人居安思危,只有自觉的主体才会有忧患意识。拯救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当务之急,然而,消极和被动的保护,只会产生递减的效应,让民族文化焕发出活力才是根本。

多元民族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一个人,只有内心世界丰富,才能发现世界多方面的意义关联,从而才能有通达的智识和创造的智慧。中国要走向世界,需要雄厚的发展力作支撑,而内在品质的丰富性更是发展力的根本所在,这种丰富性就存在于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之中。这就是中

国古代先贤所确立而为万世所尊奉的价值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民族教育仍须大力倡导并确立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以营造促进多元文化发展的有利的人文环境。百年来，民族教育最突出的成就是人们观念的改变。民族文化生命的生长需要一个生境，这需要人们懂得它的价值、欣赏它的美，进而为它的自我更新和再创造培植资源丰富的生境。不仅教育与民族文化是双向互动的，民族文化内在的生长力与其环境之间也是双向互动的，民族教育必须在培植土壤和开发智力资源两个方面努力，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整合为一体，方能健康发展。

四、问题与方法

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深层次的融合，在于以教育之功提升民族文化的发展力。早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在其《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中就论述到“人是教育的产物”。他说：“人生而无知，并非生而愚蠢，甚至非花一番气力不能变得愚蠢。为了变得愚蠢，为了把心里的自然光明扑灭干净，一定要有技术、有方法；一定要有教育在我们心里堆积起重重错误；一定要饱读许许多多的书，使偏见层出不穷。在文明民族中间，如果愚蠢是人们的共同状态的话，那是一种传染性的教育的结果；那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受到伪学者们的教导，在那里读了愚蠢的书。”^[13]启蒙者的话揭示了一个道理：教育要让人变得聪明，就得对不同人实施不同的教育。其实这个道理人们很早就知道，民国时期，朱家骅等人就已经提出民族教育要结合民族生活来开发民智，然而好的理念一接触实际就变样。

开发心智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同自然资源的开发一样，也存在一个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很多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智力资源具有民族性特征，而这些特征与民族生存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密切关联，其形态发生与结构稳定性是在一个长期适应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造成了智力特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必然导致对智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这不仅使个体的未来发展难以为继，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化生长的智力源。当前民族教育的突出问题，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是课程与民族生活的实际脱节，智力开发与民族文化背景割裂。

为了使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关联起来，有识之士从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研究与编写民族地区乡土教材，时至今日仍努力不懈，已经有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乡土教材所涉及的，更多是关于民族文化的知识及其自然人文生态的介绍，其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然而就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来说，显然还达不到相应的层次。近年来，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在一些地方开展得轰轰烈烈，颇有成效，但也有不少的民族地区学校是在走过场，使其成为了形式化的东西，带来的是负面效应。并且，只是一些歌舞、绘画、手工等民族文化形式进入了活动课程，人们大多不从智力资源开发的高度去选择内容和组织实施，很多时候不过是为了活跃校园生活、体现文化特色而已。民族文化课程资源开发，首先要对民族智力特征有充分的了解，然后是对其文化土壤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知识与原理层面进行深度的挖掘和提炼。迄今为止，我们尚缺乏这样的专业队伍和真正有深度的研究。

从课程视角来思考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有人类学的视角。课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选择，并不是所有文化都适合进入课程。教育要发挥文化选择的作用，就得从内容上精选和提炼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意义的要素，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以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对不同民族智力倾向和根本特征进行充分的调查和研究。譬如精于骑射的民族与擅长思辨的民族，必定有着十分不同的智力特征。由此推开来，诸如游耕、采猎、航海、稻作等依赖不同的资源环境而生存的各个民族，在漫长的时间里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而每一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都凝结着族群千百年来累积的知识和经验。从诸如歌舞、器乐、工艺、壁刻、建筑等可见可闻的艺术形

式,可以感受到其节奏与旋律、色彩与线条的精心设计与组合,其间隐藏着一种只有在特定的生活情景中才能生发的智慧。从这些窗口可以窥见或悟出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全部奥秘。斯普朗格说:“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指向不断发展着的主体的个性生命生成,它的最终目的,是把既有的客观精神(文化)的真正富有价值的内涵分娩于主体之中。”^[14]课程若从这些方面关照人类种群不同的认知特征,民族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民族智慧的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才真正有望得以实现。

选择文化需要洞察力。大数据时代和新丝路背景下的文化选择,是民族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将要逝去的必然无可挽回,然而,什么是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什么可以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蓬勃发展?说得现实一点,民族文化中有什么精彩的东西能重新焕发出时代的生命力,并经由新丝路再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能够通达世界的,不仅仅是不一样的,而且还要在本质上能臻于化境。千百年自然人文生态酝酿的艺术和技巧,世代相传的秘诀和匠人苦心孤诣而累积的经验,还有那离开本土便失去地道风味的造物,都是值得珍视的,其中都有值得深入挖掘的智慧资源。若不论糟粕与精华都一股脑儿将其捡回来塞进校园,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有损未来事物的生长之力。知几知微,方能开物成务,崇德广业。何为“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易·系辞下》)如何预测和把握未来之事?以科学的方法,是从各种现实的存在中搜集资料,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决定未来趋势的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和相互作用的规律。然而,科学终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途径,科学之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混沌与不确定性遍及一切领域,非线性因素随机作用,要素难以完全把握,世界总在人的预料之外。《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的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揭示了一个道理:“不论知识如何高深,它始终受制于某种程度的无知。”疏于防范从根本上来说,源自我们的无知。事实上,无知可能并非造成一切困境的唯一原因,该书还提出了“知与不知,作为与不作为”的问题。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道德与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是导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直接原因,也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人文方法的实质就是“以文化人”,其意义首先在于道德情感价值观的文化建构,具有“深根固柢,长生久视”(《道德经·第五十九章》)之功能。其次,人文与自然的契合,能够提供认识自然和通达自然的多种途径,以弥补科学思维之不足。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丰富多样,人们与天地系统交流的方式和途径也不一而足。其与科学的思维逻辑虽然不是一路,但也并非毫无价值,其人文生态意义也需重新认识。

教育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真善美,民族生存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是科学之根、人文渊薮、艺术摇篮。青蒿素中有尖端科学,人文蕴于山川,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美美于野。因此,“学在田野”,民族教育理论必须立足于本土,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我们一贯倡导并践行的田野方法还须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民族教育基本理论建构与教育实践应密切联系。马克思有句经典名言:哲学家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5]。推动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力量来自底层的民众,“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经·系辞上》),顶层设计必须落实于底层的建构。在国家、民族、族群、个体的层次关系上,个体的身心和谐发展是一切和谐发展的根本基础,包括最高层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从和谐发展的人们之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而每一个体都有适合他自身发展的特殊教育需求,这种特殊性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文化之中。满足民族社会个体成员的教育需求,是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交往与互动的要旨之一,其最终目标则是实现基于底层的和谐民族社会建构。

参考文献:

- [1] 倪胜利. 教育文化论纲[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37.
- [2] 宋兆麟. 巫与巫术[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28-29.

- [3] 泰勒. 原始文化[M]. 蔡江浓,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 [4]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6(4):3-21.
- [5] 宋恩荣,章咸.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 修订版.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5.
-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815.
-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8] 韩达.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3卷[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115.
- [9]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282.
-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抗战未来之教育[A]. 卷宗号:五,12414.
- [11] 王鉴. 民族教育学[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251.
- [12] 欧文·拉兹洛. 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M]. 闵家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71.
- [1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80-481.
- [14] 邹进. 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4.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Reflections on the A-Hundred-Year Interaction between Ethnic Culture and Modern Education

NI Shengli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Ethnic culture, which derives from the uniqu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is primitive, simple, harmonious and native. It i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pontaneously. In the past over one hundred years, great changes in society have brought about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which makes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lose its condition to survive. Modern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in the ethnic areas out of nothing and from being minor to major, and then popularizes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and agglomerates the ethnic spirit. In addition, it has opened a door to the worl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grating the cultural systems with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However, the modern education whose main purpose is to assimilate cultures neglec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the reality of the ethnic surviving, which increasingly impairs the internal impetus of the ethn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history, observe the reality, gain insight into the future, think from the root of the ethnic culture so as to recognize and establish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s and value solicitudes of the ethnic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ethnic culture, and to explore the impetus of the ethnic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nly in those ways can we find a way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ethnic culture; ethnic education; modern education; education cultur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责任编辑 邓香蓉